这样靠政策托起来的价格注定不可持续。  
　　看市场，现在人们不仅要吃饱，更要吃好、吃得放心，需求升级了，有效供给跟不上，粮食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而粮价、补贴接近“天花板”，资源环境又遇“紧箍咒”，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刻不容缓。  
　　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下调最低收购价，实行“市场定价、价补分离”，为的是减存量、抑增量，让粮价逐步回归市场。同时，粮价由“托市价”变“托底价”，给农民吃下“定心丸”，保障种粮不亏本。但这个“托底价”并不是市场价，眼下一些地方优质稻谷价格依然坚挺，这传递出一个信号，今后种地不能一味追求产量，调好结构、调优品种，才能更有赚头。  
　　有人担忧，调价会不会造成“谷贱伤农”？从两年来玉米供给侧改革实践看，大可不必担心。2016年玉米取消临储政策，价格从只涨不跌到随行就市，多的调下来，少的调上去，田野上的加减法，换来一手好牌，玉米调减1477万亩，大豆、蔬菜等增加1700万亩，失衡的大船掉过头来，全国玉米库存下降28%。玉米价格开始回归理性，每斤从0.6元上涨到0.8元以上，加工企业活了，农民收益稳了，产业走出“死胡同”，焕发新的生机。  
　　由此看，这次稻谷调价是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务之急。这既是一场全方位的生产力调整，也是一次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既要考虑量的平衡，也要实现质的提升和可持续健康发展。那么，结构怎么调？  
　　坚持市场化方向。调优结构，消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拓展高端供给；调好方式，推行绿色生产，既还历史旧账，也为子孙后代留生存和发展空间。进一步完善政策的精准性，以优粮优价导向，引导农民盯着市场种、跟着需求走，产得优、卖得好，让种粮成为有赚头的产业。  
　　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粮食多点少点是技术性问题，但粮食安全是战略性问题。13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新时代保护粮食产能，要加快推进向提质导向转变，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构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保障农民增收是目标。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不成功，要看供给体系是否优化，更要看农民是否得实惠。要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节奏，逐步实现市场定价，既要反映市场供求，又要防止粮食价格大幅度波动，特别是要避免粮价过快下跌，稳定农民收入这个基本盘，确保不发生大面积“卖粮难”，不让种粮农民吃亏。  
　　主要植棉区几乎“无膜不棉”  
　　种棉花一定要覆盖地膜，这似乎已经成为常识了。一到植棉季节，农民朋友早早就买好塑料薄膜，技术人员也会现场指导。  
　　覆盖地膜可以增温保墒、抑制杂草、防虫防病、保水保肥……在我国西北、东北、华北等植棉区，几乎“无膜不棉”。  
　　新疆是全国最重要的产棉区，仅南疆棉花种植面积就达2000万亩，约占全疆的2/3。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在棉花种植上大范围推广使用地膜覆盖技术，棉花产量因此大幅度提高，给新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带来了巨大效益。  
　　但是，棉农对地膜又有一种复杂的情结：带来增产不假，却也成了棉田“白色污染”的祸首。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唐华俊说，近30年来，我国地膜覆盖面积和使用量一直位居世界第一。这其中，新疆的地膜用量更是首屈一指。  
　　“使用地膜可提高作物单产20%—30%，大面积推广促进了新疆棉花生产，对新疆的棉花生产来说，使用地膜确是一次伟大的‘革命’。”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礼胜说。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地膜残留终于露出它狰狞的一面。  
　　“随着地膜使用量不断增加、残留地膜回收率一直偏低，土壤中残膜量逐步增加，土壤结构遭到严重破坏、耕地质量逐步下降。现今，新疆已成为残膜污染严重的地区之一。”杨礼胜说。  
　　据调研报告显示，当土壤中残膜量达到每亩3.5公斤后，棉花会减产11.8%—22%。而且种子若播在残膜上，烂种率和烂芽率也会大大增加。  
　　残膜污染还会影响原棉质量。中国工程院院士喻树迅说，对于机采棉而言，残膜会随机械混入棉花，构成棉花“三丝”污染的“生力军”。这将给棉花的纺线质量和染色带来很大影响。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毛树春说：“残膜就在地下0—30厘米的耕作层里，挖起来都是碎片。”他说，治理农田残膜污染“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刻”，因为当污染量持续积累，不只会影响作物产量和质量，还会给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减少使用或不使用地膜，已成为未来棉花等农作物种植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为了把残膜从农田请出去，农业专家们试过很多办法。杨礼胜介绍，大量科研工作者在地膜降解和残膜回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努力。  
　　从2012年开始，国家在新疆实施了农业清洁生产示范项目，先后在新疆46个县市开展了农田废旧地膜污染综合治理。从2016年5月1日起，新疆正式实施农田地膜管理条例，不但拒绝超薄地膜生产销售使用，并规定废旧地膜要做到100%回收。  
　　科技让种棉花可以不覆地膜  
　　巧解“白色污染”，当然要靠科学技术。  
　　2017年9月底，在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的中国工程院沙雅院士专家工作站，50亩无膜棉花试验田里挂满了白花花的棉朵。  
　　现场专家介绍，喻树迅带领他的研究团队，通过连续7年在南疆多地的试验示范实现了棉花的无膜种植。  
　　种棉花不覆地膜，这在棉花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事实最有说服力！经过专家现场考察和测产，该示范田亩结铃数达7万多个，平均亩产量365公斤以上，高产地块亩产达400公斤，与大面积种植的地膜棉产量相当，呈现出早熟高产的特性。经第三方科技成果评价机构评价，该技术为彻底解决棉田残膜污染创新了具有颠覆性潜力的技术途径，关键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原来，在棉花播种的时候，会经常遇到低温冷害，直接影响棉花出苗。而在秋天收获季节，低温霜冻等不良天气，也会影响棉花产量和收获。针对这些问题，喻树迅发挥自己科研团队在育种方面的优势，与相关科研单位和企业联合试验、协同攻关，从选择新品种入手，培育出具有晚播兼具早熟的品种“中棉619”。  
　　记者了解到，“中棉619”可以晚播种10多天，正好躲过了春天播种时的低温；由于具有早熟的特点，又巧妙地躲过了秋天收获时可能遇到的低温霜冻等不良天气。通过这些特点，实现了棉花种植不再需要覆盖地膜的目标。  
　　在南疆地区无膜种植棉花，出苗率和成苗率是决定是否可行的关键因素。“中棉619”通过丰产、特早熟、耐盐碱、耐低温的四亲本聚合杂交选育而来，兼具了特早熟、耐盐碱、耐低温等优点，适合在温差大、盐碱重、长日照的南疆地区进行无膜种植。  
　　“中棉619”在南疆地区无膜栽培条件下生育期约120天，相比于地膜覆盖棉花，可推迟10天左右播种，能有效避免早春时期冷害对棉花的伤害。耐盐碱、耐低温的特点，让这一品种在无膜覆盖条件下也能够快速萌发出苗，其出苗率和成苗率与覆膜条件下的出苗率和成苗率无明显差异，不会因出苗率和成苗率影响棉花产量。  
　　喻树迅院士研究团队专家介绍，为实现无膜棉综合技术的配套，针对无膜种植和生长特性，利用精量播种技术实现一播全苗，可省去间苗、定苗等管理过程；添加了穴播器拨片装置，避免了由于无膜覆盖导致的穴播器堵塞；为有效保温、保水、保墒，进一步加强出苗率和成苗率，将穴播器播种深度增加为3.5厘米（比地膜棉深播0.7厘米），同时将滴灌带浅埋于土下2—3厘米，实现滴灌带的固定和有效灌溉，避免风害。依据无膜棉田间生长情况，适当提高了种植密度，每公顷种植株数增加了4.5万株，在保证棉花产量的同时减少了用药量，既节约成本，也可保护环境。  
　　协同创新才能走得更远  
　　“去年受苗期连续阴雨天气影响，出苗率只有75%左右。如果出苗率能提高10%，产量还能够再增加不少。”负责示范田管理的新疆守信种业公司一位负责人说。  
　　同地区的覆膜棉高产田最高产量可超过每亩500公斤，相比之下，无膜的“中棉619”这一产量的确略显逊色。但在毛树春看来，无膜种植能实现超过350公斤籽棉的亩产量“已经不低了”。  
　　“按照41%的衣分计算，每亩的皮棉产量约150公斤，产量就基本有保证了。”毛树春认为，从产量上看是比覆膜棉田要低，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从综合评价来看，无膜植棉已经开了个好头。  
　　尽管如此，无膜棉要想继续推广，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无膜棉种植给科研和生产提出了很多新问题。比如如何破解僵苗问题、抗除草剂品种选育等；此外，无膜棉的播种技术、肥水调控等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毛树春说，“农业新技术从试点到示范、推广一定是稳步进行的，要一步步来。”  
　　喻树迅也表示，无膜棉如今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今后在抓产量的同时，也要考虑抓品质。“特别是育种方面，需要协同创新才能走得更远。”  
　　在浙江省泰顺县筱村镇的田间地头，农民一看到吴振我，就赶紧围上去，争先恐后地问：“水稻叶尖发黄是怎么回事？”“快瞧瞧我这水稻是不是有虫子了？”他耐心地一一解答，直到农民满意为止。  
　　吴振我是筱村镇农业公共服务中心主任，也是当地的庄稼“名医”，他三十年如一日，像一头勤勤恳恳的“老黄牛”，辛勤耕耘，助力当地粮食产量一次次突破历史纪录。提起这位“老牛”，当地农民都会竖起大拇指夸一句：“‘老牛’真牛！”  
　　为庄稼望闻问切，为农民排忧解难  
　　刚工作时的一件小事，一直印在吴振我心中。一位农民的庄稼“病”了，找到吴振我，经过检查，发现水稻得了生理性病害，他提供了防治办法。几天后，这位农民又找到他，握着他的手，不停地感谢。  
　　吴振我说，一亩三分地关系着农民的全家生计，能够用自己的知识，为他们排忧解难，觉得工作特别有意义。正是这份“初心”，激励吴振我在农技推广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1999年，当地遭遇特大冰冻灾害，坡头村的茄子大面积冻死。吴振我赶到现场，看到老农坐在田埂上，哭着说：“银行的贷款怎么还”“往下的生活还怎么过”，吴振我仔细观察后发现，如果及时采取措施，说不定能“起死回生”。他一边安慰农民，一边向县里的农业专家求援。经过“会诊”，商议出治疗方案，在最大程度上帮助农民挽回了损失。  
　　吴振我说，农业农村的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农技员应以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为使命，攻克农业技术难关，推广现代生产方式，帮扶农民与现代农业接轨。  
　　吴振我积极探索，全面推广水稻集中育秧、单季稻五改栽培等技术，促进当地水稻产品和品质“双提升”。倾力打造万亩单季稻高产示范片，年示范种植水稻面积1.08万亩，平均亩产605公斤，累计增加经济效益950万元。在农业公共服务中心技术支持下，筱村镇积极建设蔬菜、粮油、茶叶、水果、林果五大基地，年产值达3亿多元；发展农产品加工、销售等，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农民收入也连年看涨。  
　　坚持想新点子、找新办法  
　　农业农村发展出现新情况，农技推广工作面临新挑战。吴振我说，这要求农技员积极探索，为农业发展想新点子、找新办法。  
　　有一次，吴振我听一位老乡说，他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可田荒了怪可惜的。这让吴振我想到，农村青壮年多外出务工，“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成了大问题。  
　　防病治虫是农业生产中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高的环节，如果防治不及时、乱用药、错用药，会导致减产减收。吴振我从此入手，希望把这件一家一户不好办的事情解决好。  
　　但实施病虫害统一防治，不少农民心里也有疑虑：有的担心费用，有的担心效果。万事开头难，吴振我组织农技站的同事们进村入户，征求农民意见，决定先把“试验田”搞好，再进行大范围推广。  
　　在吴振我指导下，泰顺县成立首家植保专业合作社，负责“试验田”的病虫害统防统治。试点刚推行的时候，农民反映用了合作社的农药，虫子喷不死。吴振我解释，这是环境友好型农药，虽说见效稍慢，只要耐心等几天，一定能见效。  
　　2010年，泰顺县出现大范围的稻瘟病和褐稻虱病虫害，一些品种甚至绝收。参加统防统治的农田却取得丰收。农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积极加入，绿色防治顺利推广。近些年，当地的化学农药使用量、防治成本分别比周边区域下降25%及30%。  
　　一次次的妙手回春，让吴振我赢得了农民的认可。他先后16次荣获省、市、县农业丰收奖。吴振我说，农技推广工作充满了挑战，如果不花大力气，不下苦功夫，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只有学得更深，办法更活，才能帮助更多的农民。  
　　本报电  春节前后，农行重庆分行开展了“欢迎您回家，农行伴您行”农民工返乡主题活动，成立“春天行动突击队”为农民工返乡送上多种暖心服务。在高速公路服务区、车站等人流聚集地带，开展金融业务咨询、业务办理以及引导引流、信息咨询等便民服务。组织开展防诈骗、反假人民币等知识宣传。  
　　近些年，农行重庆分行还积极创新模式和产品，助力当地打赢脱贫攻坚战。在彭水县打造“普惠+特惠+互联网”金融扶贫示范区，为县里1.61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精准扶贫贷款，通过发展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行长韩国强表示：“贫困户不脱贫，农行不退出。”  
　　（潘钰琳）  
　　辽宁省北镇市组建“农民讲师团”，设立“田间课堂”，通过现场授课，帮助农民发展大棚蔬菜产业。图为蔬菜专家李凯（左二）在为菜农讲解蔬菜嫁接技术。  
　　李铁成摄（人民视觉）  
　　本报电  春运期间，山西大同铁警开设了“铁警直通车”农民工服务岗，切实让农民工感受到乘坐火车出行的便利、安全、温馨。  
　　从1月初起，大同铁警组织管内8个客运量较大的车站派出所，向农民工宣传铁路安全出行常识。春运期间，他们在车站广场、售票厅、候车室、站台上、列车上设立安全服务岗。候车室服务岗提醒农民工别坐错车、误了点，检票口服务岗防止农民工丢失物品和小孩走丢，站台服务岗帮助农民工扶老携幼、递行李，切实让农民工增强乘车安全感。  
　　（郭艳梅）  
　　春节刚过，古城西安年味依然浓厚。走进鄠（hù）邑区祖庵镇大庵村，71岁的张旭东起了个大早开始忙活。厨房里是年前新置备的灶爷像、饦饦馍和祭灶用的红蜡烛。  
　　手捧红烛，张旭东感慨万分。从自家制作蜡烛算起，如今已是第三十八个年头。  
　　大庵村原名庆贞庵，村因庵得名。上世纪80年代，村里家家户户开始制蜡，一入秋冬，炉火日夜不停，大庵成为远近闻名的“蜡烛村”。  
　　“刚开始，家里只有2台蜡烛机。”张旭东回忆，“那会儿骑着自行车，到县城赶集，一天能卖3箱蜡。”  
　　正说话间，门外响起汽车喇叭声。张旭东的儿子张亚兵开着大车，刚从批发站送货回来。一趟下来，卖了200箱蜡烛。  
　　1980年家里开始制蜡时，张亚兵只有6岁。跟着父亲耳濡目染几十年，当初的娃娃已变成“老把式”。进门还没停歇，张亚兵挽起袖子，向记者介绍起了“制蜡绝活”——  
　　首先是熬制蜡油。将白色原料石蜡倒入大铁锅中，待其融化。若制作红蜡，还需加入工业颜料，由蜡红和蜡黄调兑而成。  
　　“调色这步很关键。”张亚兵说，蜡红颜色为暗红色，蜡黄则使蜡烛更加鲜亮，“熟练工凭借丰富经验，能准确拿捏两者的比例。”  
　　制好蜡油，工人用桶灌满，将其倒入蜡烛机。张亚兵家院子里，摆放着十几台半自动蜡烛机，5名制蜡工正忙得火热。上前仔细端详，机器上有一排排圆柱形槽洞，中间串有棉芯。蜡油外围，设有冷水循环系统，助其快速冷却。  
　　“我家产的蜡烛，从10克到1斤多，大小不等。”张亚兵介绍，细蜡15分钟便可冷却，粗蜡需近一个小时。  
　　时间一到，红色蜡油凝固成红烛。工人娴熟地取出，码放整齐；倒上新蜡油，待其冷却后，再剪断上一波蜡烛的棉芯。  
　　“最后就是包装和装箱。”张亚兵带着记者走进后屋，一筐筐制好的蜡烛旁边，6名包蜡工指尖飞舞，一手抓起10支蜡烛，另一只手拿张白纸抹上浆糊，将蜡烛根部包成一把，动作干净利落。  
　　大庵村制蜡工艺，曾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巅峰。进入21世纪，蜡烛市场供大于求，村民选择外出打工，人才渐渐流失。制蜡利润低、工作累，年轻人不愿意学。如今，村里共有14家坚持制作蜡烛，从业人员约300人，以中老年为主。  
　　腊月以来，蜡烛生意正红火，张亚兵却琢磨着转型。“我想从工艺、销售两方面入手。”张亚兵说，传统蜡烛造型单一，今后，想探索年轻人喜欢的样式，并加入香型。“销售上，目前都靠多年来积累的熟人资源，今后有机会，还想尝试电商。现在的网络，力量大着呢！”  
　　  
　　小贴士  
　　怎么去：从西安绕城高速进入京昆高速，向西南行驶约19公里，再沿105县道向西行驶约18公里即达。  
　　人与自然之间的天然纽带随着文明的进步已日趋松弛，但人类的自然情愫历经千载万年却从未释怀。中国人借助山水画的艺术形式表达这一自然情愫，一部中国山水画史也便是一部中国人关于自然的情感历史与精神传记。  
　　自然情愫的图像嬗变  
　　中国人以“山水”作为自然的指代，不只是一种思维的抽象，更是对于自然的诗性感知与发现。  
　　从上古至秦汉，山水或是作为神仙居所，或是作为祭拜对象，或是作为“比德”象征，或是作为通向“道”的媒介而存在，那一时期的山水图像只是一些零散的山石、树木。而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文人官宦所集聚的社会名流、上层集团在道、释、玄的思想驱动下，萌发了一股强烈的重返自然的激情与热望，原本作为“自在之物”的山水因此成为一个新被发现的审美对象，成为一种凝结着生理舒适感与视觉悦目感的现实而具精神性的空间。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中从此生长出山水之乐。山水也逐渐从宗教画和故事画的背景中独立出来，成为绘画主体；作为自然情愫图像表达的山水画，以山川景色为载体实现着人们皈依自然的情感诉求。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在洛神与曹植的身影背后描绘着树石流水、河岸远山，它们为这一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铺设了“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的自然空间。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现存最早的卷轴山水画，表现了悦目怡情的自然风光。远山高耸，白云缭绕，山石积翠，树影婆娑；山间瀑布垂下，激起珠光一片；朱桥衔接台岸、近坡，坡陀上桃树掩映，绿草如茵；游人或策马而行，或寻径闲步；春水初涨，微波粼粼，二三佳人沐浴熏风，荡舟远眺……一派春和景明的旖旎风光，一派纵享山水的陶然心境。这是美的目光与大自然欣然相遇的情与景偕。  
　　美的目光同样诱导着唐代的自然情愫。唐人富于诗人气质，他们用浓酒般的热情拥抱山水，也用唐诗般的浓情把丘壑林泉之美渲染得淋漓尽致；他们敏感而多情，纵情于现实山水，却将其表现得如同“湍濑潺湲，云霞缥缈”的神仙之境。青绿山水技法语言的成熟也为将这般美景描绘得绚丽多彩提供可能。李思训（传）《江帆楼阁图》即是用江天一色、波光万重、轻舟荡漾、巉岩幽岭、松竹掩映、桃红椿绿、水榭朱栏等，烘托出日丽风清的江岸美景；而李昭道（传）《明皇幸蜀图》所表现的本是“安史之乱”后唐玄宗仓惶出逃、避难入蜀的窘迫经历，但却也一定要把那蜀地山水画得群峰竞秀、山花争妍。  
　　晋唐以来观看山水的美的目光，在五代时期被注入探究自然的理性意识，及至北宋形成尚理的自然情愫。五代北宋的山水画家纷纷涉足于真山真水，用现实而具体的地理样貌来表现“图真”的山水。荆浩、关仝及李成、范宽、郭熙所代表的北派山水以石质坚凝、重岩叠嶂的北方山水为原型，描绘崇山峻岭、千岩万壑的壮美气象。董源、巨然为代表的南派山水，以峰峦平缓、草木繁茂的江南景色为原型，表现轻岚淡烟、平淡天真的山水意境。无论北派、南派山水画家，都借对于自然的逼真描绘，来表现他们所领略的山水的内在秩序感，以及对于自然带有敬意的理性思考，他们把山水看作是可游、可居，身临其境的现实空间。而同样是表现江南山水，南宋的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却画出了苍劲雄强之势，因为，他们将笔墨方硬刚劲的斧劈皴法笼罩在江南景色之上。  
　　皴法到了元代画家笔下就从对自然山石的如真描绘中日益独立出来，元代画家观看山水的目光中就带有鲜明的皴法内容，与其说他们是在观看山水，不如说是在自然中印证其笔墨图式，他们将自然的一石一景收纳于纸上的一笔一墨；他们在对自然的凝思中获得内在心性的独特体验，自然情愫的表达也便成为文人逸气的抒发。于是，就在黄公望、倪云林、吴镇、王蒙的山水中呈现出寂静的山野、清旷的湖水、孤影随波的扁舟、空无一人的草亭。他们以书写“胸中逸气”的“逸笔草草”演绎出符号性的山水笔墨，笔墨意趣也便表征着平淡、高逸的精神品质。这种笔墨的独立性在明清山水画家手下被进一步强化，自然山水的许多生动细节就被忽略，笔墨自身就仿佛一个完整的自然，在山水图式中游戏笔墨就仿佛一种对于自然的情感诉说。明代董其昌说“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一笔下去就是一个自然的写照；清代王翚自述其山水是“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对于自然的情感可以不诉诸现实山水，而是倾注在对于前人笔墨图式的摩挲玩味之中。中国山水的图像表达也就从晋唐时期的自然写实嬗变为一种自然象征，山水画所表现的自然情愫也就从晋唐时期的美的发现嬗变为一种自娱与遣怀。  
　　然而，虽历经嬗变，“天人合一”的文化感知方式却一直贯穿在中国山水画家的自然观照之中，他们视自然为知己，不仅身即山川，而且精神与之往还，他们永远“在”自然。  
　　山水画与风景画：  
　　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  
　　事实上，世界各文明早期都怀有对于自然的强烈依赖与迷狂崇拜。但随着文明的多元展开，自然在不同的文化中就遭遇到不同的目光。与古希腊对于人体美的崇尚不同，自先秦以来的古代中国始终将目光投向于自然；对于山水一往情深，这是中国人倾注于自然的一种独特的情感方式。  
　　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古典艺术，一直将“人”作为观察与表现对象，甚至直至文艺复兴，其雕塑、绘画也依然主要表现美的典范与象征的人体，在完美的人体中寄寓鲜明的理性情智。西方文明的认知与思想的底层逻辑是关注自我、认识自我，从而形成“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是万物的尺度”等人类自恋式的精神传统。这一精神传统将自然看作是外在于人的对象性存在，自然与人的关系是彼此割裂、对峙的，其所维系的情感，就或是深重的恐怖感或是强烈的征服欲。  
　　因此，西方风景画的历史要远远晚于中国山水画。如果说在中国的魏晋时期，就将美的目光投向自然并已产生了山水画，那么，欧洲的风景画则初现于17世纪的荷兰，至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在欧洲兴起，画家的视野开始拓展到天空、大地、森林、河流及草地等，真正意义上的风景画才最后形成。代表着那一历史时期欧洲风景画艺术高度的透纳笔下的风景，或是翻滚的海浪，或是峻耸的高山；或是雷电交加，或是暴雨倾盆；或是火山爆发，或是洪水肆虐；或是烈日，或是狂风；……而这些让透纳一生为之动容的“如画”风景，在中国人看来不过是奇观异景，它带给人们的心理感受除了惊叹也还是惊叹。北宋郭熙《林泉高致》中所说的“可望”“可行”“可游”“可居”，不只是景致的自然分类，更是人对自然情感体验的价值区分，“可望”的奇观是人类永远走不进去的风景，而可游、可居的山水才是人类的理想栖居地。栖居的意义不只是身体在自然中的舒适和宜，更是心灵在自然中的自由舒展。  
　　中国山水画就这样表征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山水草木一样，其自身已经融入自然的生息之中，自然也便是人的生命的一种外延。因此，中国山水画构筑出人与自然浑然融合的和谐画面，人在山水中，情在自然间，人的自然情愫向着山水倾诉，山水便映射出“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的人在自然状态。  
　　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对于自然的观看方式便因此而迥然不同。西方风景画家始终在独立于自然之外的立场来观看自然、认识世界，他们是在一个固定视点下对于自然景物进行片段截取，看到的是体积、明暗、光影、透视、色彩等的视觉真实。而中国山水画则绝非对某一固定视点下视觉映像的直接描摹，而是自然本身形质样貌的自在呈现，无论是画家还是观赏者的目光，都是与这一呈现过程中一个个生动的自然细节的不期然相遇。中国山水画家将自己置身于自然生命之中，心随山水而宛转，在一种“游”的状态中俯仰宇宙、吐纳自然。无论是郭熙《林泉高致》的“三远”，还是沈括《梦溪笔谈》的“以大观小”，无不是这种观照方式下的空间呈现。它们都既不是现实的物理空间，也不是视网膜映像中的视觉空间，而是经过饱游饫看而形成的山水意象，是从自然本身生发出的令人神畅的诗性空间，是中国人关于人在自然中的自我位置与存在方式的图式证明。  
　　然而，人类进入现代化进程以来，文明的发展方式基本上是以西方科技优先为主导。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人们已经骄横自大地将自